

# 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的一个经济社会学解读

## ——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结合的视角

李 敢，曹琳琳

摘 要：海外华人在对华投资中表现出一些特殊的性状与特征，这些特征如从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论的角度看，其间融汇华人香火价值观与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论，从华人投资的状况看，有必要对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现象做出一个经济社会学的解读：海外华人对华投资是一个“寻利”和“觅情”相交织的过程，“‘利’主‘情’辅”是其投资本相所在。“经济人”视角与“社会人”视角对于解释海外华人对华投资都是必要的。

关键词：海外华人；对华资本投资；文化传统；社会资本；经济社会学

### 一、海外华人的概念界定

海外华人，从国际移民史与华侨华人研究史角度讲，海外华人为国际移民与华人移民运动的产物，是一个范围很大的概念，其语词上的意义当接近于华侨华人一词，可以包括华侨、华工、华商、华裔等子概念，学术界目前尚未能达成一致认可的意见并予以清晰地概念化，例如，原香港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学者王赓武认为，海外华人是指生活于中国大陆，以及港澳台之外且承认自己有中国人血统，是华人后裔，内心认同中国文化，或被人口统计学家认可为华人的华族人士。<sup>①</sup>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研究所讲座教授刘宏以国际移民研究中的“散居者选择”理论（Diaspora Option）为依据，认为“海外华人”英文表达应为“Chinese Diaspora”，是具有历史性、结构型和社会性等特征的中国海外侨民群体。<sup>②</sup>台湾著名民族学学者吴主惠则将满足华侨的条件归类为四种：（1）在外国的中国人；（2）与中国有法律关系的中国人；（3）与中国有经济关系的中国人；（4）现存与中国有联系的华侨社会等。<sup>③</sup>国务院侨办则认为，海外华人“也称外籍华人，是指华侨的后裔已加入或取得住在

国国籍者”。<sup>④</sup>出于对文化与国族认同的强调，对于“海外华人”概念界定，本文原则上认可王赓武教授的见解。参照这个定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丘立本研究员在援引国外相关研究统计及其自身研究基础上估算出中国现有海外移民3800万左右，这个数字是指鸦片战争以来海外华侨华人及其后裔的现有存量。<sup>⑤</sup>

### 二、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的现状与特征

#### （一）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在外资引进与促进国内经济转型与发展方面（如增加财税收入与人才培养，提升企业管理能力，以及拉动对外贸易等），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的贡献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从1979年到1997年，流入中国的外资超过三分之二来自于华裔，而在过去的10多年来，大约有60%的外国直接投资是经由华裔引进的，他们在华公司占在华外国企业的70%。<sup>⑥</sup>再如“自2006年至今，海外华侨华人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sup>⑦</sup>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预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形势

\*作者简介：李 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275）；曹琳琳，海军兵种指挥学院陆战岸防指挥系讲师（广东 广州，510000）。

①Wang Gungwu, "Greater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1993), pp. 926-948. 转引自刘 宏《海外华人研究的谱系：主题的变化与方法的演进》，《华人研究国际学报》2009年第2期。

②[新加坡]刘 宏《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开放时代》2010年第8期。

③吴主惠《华侨本质的分析》，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3年，第10~12页。转引自[韩]朴起彻《华侨网络和对华投资特点浅析》，《中国流通经济》2010年第6期。

④华侨华人概述编写组编《华侨华人概述》，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内部版），1993年，第1页。

⑤丘立本《国际移民的历史、现状与我国对策研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⑥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6. 转引自刘 宏《海外华人与崛起的中国：历史性、国家与国际关系》，《开放时代》2010年第8期。

⑦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页。

的持续强劲,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的范围与合作空间也将继续得到延伸与拓展。

## (二) 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的特征

虽说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人对华投资有优惠政策,但海外华人对华投资优先汇聚于中国南方侨乡相对集中的省份地区,如广东、福建等。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不单是因为南方人出国成为海外华人多于北方人的缘故,更是因为,相较于北方,中国南方有着更为强劲密集的传统人际关系,这使得南方地区对祖籍本土的海外华人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更容易吸引这些海外华人的资本<sup>①</sup>(也正是由于南方在“情分”方面远重于北方的缘故)结果也造成了南方迁出地在吸引海外华人对华投资方面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的规模、密度与集中性以及其中社会资本的总量与分量也远远大于原北方迁出所在地。于是,海外华人对华资本投资特征除了前述的在投资选择地上南方高于北方,还有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往往与故乡有机结合,这可谓海外华人在对华资本投资方面的一个普遍性特征,另一个是充分利用其中的人际关系网络。

王望波博士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相当部分东南亚华裔对华资本投资是带有家乡情感因素在内的,其投资集中于祖籍地,一般是通过利用宗亲关系及他人文优势成功地把社会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从而减少了资本跨国经营的开支。<sup>②</sup>胡晓玲硕士也认为,东南亚华人亲缘和地缘网络促进了他们在居住国与祖籍国之间经贸商业网络联系的生成,东南亚海外华人以中国本土和海外移民构成的东亚太平洋社会为纽带组建的商贸网络的顽强生命力“不仅缘于经济利益的寻租,而且扎根于血缘、地缘、业缘的牢靠关系的基础之上”。<sup>③</sup>韩国政治学者朴起彻研究也证明,海外华人对华资本投资中与网络相关联,充分利用灵活多变的人脉地缘关系,这在其他国家无法找到类似的内容,譬如,投资地区多与故乡相结合,经由相互间或者是家乡的亲戚和政府机关的人脉和地缘关系进入中国,在对华大规模投资之前,往往先是以在故乡修建学校、公路、医院等为基础,以取得政府的

好感与认可,这个过程对于获得各种权力的支持有很大效果,由此同中央与地方的人脉关系疏通也变得愈发有利。<sup>④</sup>依据以上若干关于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特征的研究,可以总结出,海外华人对华资本投资总体特征为“寻利”或“觅情”,或兼而有之而轻重不一,但无论哪一种情形,依托借重的大抵都是祖籍国与居住国之间的群体互动人际关系网络<sup>⑤</sup>属于文化传统及其构建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力量在桑梓宗亲之情方面的灵活运用。

## 三、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的社会学诠释: 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相结合

### (一) 文化传统—关系社会—社会网络

文化传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这方面的经典论述以社会学三巨头之一·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代表,其要义在于论述“精神怎样与结构结合起来一道构成一种新的经济形式”,书中有一个在社会科学界闻名遐迩的论点,即新教徒的生活伦理思想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绝非是个体意义对私利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为全人类所共有,而非西方文化特色,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这些个人必须拥有共同倾向”,其结晶就是资本主义“工作伦理”——支持理性的追求经济利益以及世俗的活动,且将这些行为赋予了正面的精神与道德含义。<sup>⑥</sup>此种在文化传统理解诠释方面对“团体生活方式与共同倾向”以及“精神与结构结合”的强调符合社会学中的社会行动论与(功能)结构论的要义。

按照社会行动论解释,行动具有意向性,且行动以他人为指向,行动的特质在于委身于一定的价值,采取一定的态度,追求一定的目标,体现为社会行动的交互性原则,而文化、伦理、传统、结构等都只是行动的过程、方式与产物而已。<sup>⑦</sup>并且,对这种兼具意向性与交互性特质的“文化—行动”解释还可以参考社会学互动论的有关论述,可以发现,行动者的互动本身就是分

①王 询 《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95页。

②王望波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裔在中国大陆的投资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页。

③胡晓玲 《东南亚华人华侨经济网络的形成、发展与转型研究》,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8页。

④[韩]朴起彻 《华侨网络和对华投资特点浅析》,《中国流通经济》2010年第6期。

⑤按照社会学的结构论,此种群体互动人际关系网络中内涵的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即是“结构”意义上的文化及其体现。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学者乔纳森·特纳认为,社会学结构理论中的“结构”包括“文化”与“网络”,再如,社会学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亚历山大也认为“文化是一种由符号集合而成的结构”。参阅[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69~71页。

⑥[德]马克思·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 晓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39页。

⑦关于该部分更多阐释,请参阅[美]T.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32页。

析单位所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之间是一种交互论。因此，本文中的文化传统指的是社会系统<sup>①</sup>（结构）内群体互动人际关系意义上的文化传统（请注意，“结构”意义上的群体是文化传统的一种体现），进而言之，本文中所言的文化传统主要是指华人文化传统。对此，台湾著名经济学家熊秉元教授以经济分析视角从结构论对中国文化传统做出了概括，指出在传统华人社会中，“人”和“关系”的重要性大大超出“法”和“制度”的重要性，匮乏相对中立客观的价值体系，对“家”的依赖很重，简言之，就是人们对人际网络的信任度远远高于对客观权威的信任。<sup>②</sup>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史教授王询也从结构论视角出发，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特质为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特殊主义人际模式，而人际关系是具有一定制度化特质的群体。<sup>③</sup>

关于华人文化传统的概念界定，本文兼采用熊秉元教授与王询教授的见解，并进一步提出，华人文化传统中的特殊主义人际模式除了“血缘”（家族）与“地缘”（乡土）根基之外，还有第三个根基，即宗族抱团理念，比“血缘”和“地缘”更广泛，姑且称之为“族缘”，这个“族缘”中的“族”既可以是姓氏宗族，也可以是以语言风俗为纽带的“族群”（譬如“广东帮”、“客家帮”、“宁波帮”、“潮州帮”、“潮州人八邑会馆”、“福建帮”和“海南帮”等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商帮”或“会馆”，乃至更大地理范畴的“南洋客属总会”、“潮团联谊年会”与“客家恳亲大会”等团体组织及活动），甚至还可以是更大更广范围的同文同种的“华族”（例如“中华总商会”或“华人公会”等）。因此，关于华人文化传统中的群体人际之间互动及人际关系类型构成的特征，综合社会学的社会行动论、互动论与结构主义视角，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情社会”<sup>④</sup>（典型表现为“人情大过天”）、“圈子社会”（典型体现为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伦理社会”（典型代表为“五伦”及其各色变种），而此三者共同演绎的

即为特殊主义取向的“关系社会”，且其中在“对得起祖宗与承得起香火”方面的文化认同是一个主要发光点<sup>⑤</sup>（“香火”演绎的不仅仅只是传宗接代，还是“生生不息”价值观的折射，内涵有对国族及其文化认同元素在内；另外，就海外华人而言，“对得起祖宗”主要指向祖籍国，“承得起香火”主要面向居住国），以上特征均属于华人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深层社会结构特质（易言之，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结构则是文化传统的一种“外化形式”），<sup>⑥</sup>也是海外华人对华投资从事相关经贸活动时如影随形的“副产品”。

在这种特殊主义取向的关系型社会中，灵活多变的群体互动人际关系网络的生成与运用也变得自然而然，该网络是以上文所述的“三缘”（族缘、地缘、血缘）为纽带基石的。按照新经济社会学关于社会网络的论说，此种（华人文化传统中特有的灵活多变的）群体互动人际关系网络是经济生活中（包括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经济活动在内）很重要的运行方式与组织形式。因为，“网络”一词本身就内含有人在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存在着某些相对固定的联系或者是类似的社会组合。而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网络理论的一大要点就在于其对经济活动“嵌入性”的强调，指出经济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经济活动是被社会性地限定着的，所以，当研究者不论从那一种角度出发去研究经济现象或经济活动时，都需要对经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结构以及个人间、群体间及个人群体间的具体互动加以考察衡量。当然，这种源于网络结构的限定也不只是令行动者一味地被动，即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社会网络）方面，“社会化不足”（如传统经济学对行动者仅是自我利益功利性追求者的设定）与“过度社会化”（如结构主义社会学中对行动者只是特定规则内化后的执行者的设定）视点都是不可取的，在真实的经济交易活动中，理性的经济行动者总是依赖于已有的

①按照系统论社会学流派代表人物卢曼的解释，所谓系统指的是人类行动的结构化，只要个体行动“有意义地相关和联系”，并利用功能机制的选择将其与物质、时间和符号环境区分开来，社会系统就存在了。参阅[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88~90页。

②熊秉元《走进经济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9~158页。

③王 询《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3页。

④台湾学者黄光国认为，“人情与面子”是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基型”，也是中华文化社会心理“深层结构”的反映。参阅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5页。

⑤李 敢《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解读——制度限制与差序格局交织视角》，《经济界》2011年第3期。

⑥此处“深层社会结构”的表述意同于社会“深层结构”，指的是社会系统表层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内在结构”。至于“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提法当为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首先提出，秉持这种结构主义观点的还有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费尔南·布罗代尔、福柯等人的学说，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即曾提出“深层结构决定表面秩序”的观点，均对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方面论述还可以参考美国历史学家华裔学者孙隆基的有关著述，如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5页。

关系展开行动的,经济行动者有目的行动(例如投资谋利)总是嵌入于当前具体的社会关系体系之中,并相应做出符合自己需求的抉择。这正印证了著名新经济社会学学家格兰诺维特的论断,从来都没有绝对孤立的经济交易,经济交易总是嵌入于稳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而包括文化传统在内的社会因素及其衍生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力量都是构建此种社会关系的要素所在。<sup>①</sup>

(二) 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的功能指向:规避风险,削减交易费用

如前所述,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个凝聚体。社会资本,在社会科学界较早使用该术语的当是第一代新古典经济学剑桥学派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他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先使用该词语去区别资本的永久性与临时性。至于该词出现运用于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学科领域时已经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事情。<sup>②</sup>此后,社会学界的布迪厄(网络资源说、“关系”说)、<sup>③</sup>科尔曼(社会结构要素说)、<sup>④</sup>普特南(组织特征说)<sup>⑤</sup>等纷纷予以丰富发展。简而言之,社会资本就是具有“公共财”(public goods)特质的社会网络,在社会资本的诸种表现形式中,最重要的也是社会网络,它们可以为网络成员提供稀缺资源,例如物质资本、信息等,也为成员的利益诉求设置一定的限定与保障,而强调群体人际之间互动的华人文化传统在此方面具有先天性的优势。

社会资本理论可有效适用于作为国际移民研究分支派系的海外华人经济贸易行为:依据国内著名经济社会学学者朱国宏教授的见解,社会资本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三个领域,其中的两个即为社会资本与移民的关系以及社会资本与经济关系的关系。譬如,有研究证明,作为经济活动的移民行为与社会资本即存在着相当的关联度,相关社会资本及相应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令居住国内的某些族群集团得以垄断其所在国某些特定的职业岗位。以东南亚为例,东南亚华人的许多经营行业便常常是受益于某一地缘或方族

群关系网络而实现垄断或者占据绝对优势的,举例说明,潮州人控制了亚洲的食物贸易和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老挝以及柬埔寨大米的贸易;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潮州人则控制了生鲜与海产的贸易,以及泰国与新加坡之间生鲜食品的贸易网。这些形式各异的华人商帮在改革开放后对华投资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sup>⑥</sup>可见,由社会资本构建的社会网络对于海外华人经济贸易行为有着重要功用:无论是从海外华人所处的居住国,抑或是其所处的地区区域,甚至是全球经济角度而言,华侨华人经济发展一般均是借助于一定的华裔社会网络,而华侨华人经济在华裔网络的构建过程中,常常又依托于由华族移民构建的“三缘关系网络”(即本文所言的“族缘”、“血缘”与“地缘”)以达到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目的,由“三缘关系”构成的华裔社会网络不仅有助于规避某些风险,例如有效地避开某一特定时期中某些居住国的国内政策对华侨华人经济发展的限制(如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现实中,对华侨华人经济的打压在东南亚某些国家已经上演过很多次了),或者是地区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例如亚洲金融危机曾对东南亚许多国家造成很大的破坏,而当时中国大陆所受到冲击影响较小,是包括海外华人对华投资在内的国际投资的一个好去处),而且有助于抢占特定市场份额,适时及时地在世界市场中分得一杯羹,毕竟华裔社会网络作为一个群体对市场信号的反应和多元选择要比单纯依靠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迁徙转移背景下的被动转移要快捷灵敏地得多。因此,华人文化传统特殊主义人际互动模式构建的社会网络及其中的社会资本对于海外华人对华资本投资经济行为的功能就在于规避风险,降低经济交易活动中交易费用。

(三) 文化传统与社会资本的相结合:“利”主“情”辅的投资本相<sup>⑦</sup>

在前文关于海外华人对华投资总体特征论述中,本文提出海外华人对华投资是一个“寻利”

① Granovetter, M.,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91 (6): 16-58.

② 参见维基百科“社会资本”词条, [http://zh.wikipedia.org/wiki/social\\_capital](http://zh.wikipedia.org/wiki/social_capital).

③ [法] 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2页。

④ [美] 詹姆斯·S. 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51页。

⑤ [美] 罗伯特·D. 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18页。

⑥ 参阅朱国宏《经济社会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3~136页;罗俊翀《论海外华商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从东南为例的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还可以参阅由朱国宏教授指导的博士后论文,张广利《引进外资中海外华人社本资本的功效率研究》,复旦大学,2004年。

⑦ 在方法论上,从人类行为经济分析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与集体主义方法论分野来看,关于海外华人对华投资这一经济现象的诠释,本文论证了源自文化传统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功能指向与落脚之地均是服务于“自利”的交易费用,可见,集体主义“社会人”视角只是个体主义“经济人”视角的补充和发展,而不是取代。这也是本文在诠释方面何以得出“利”主“情”辅总结的一个原因所在。

和“觅情”相交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华人文化传统中特殊主义关系型社会关系网络及其中的社会资本力量发挥了重要功用，即华人文化传统中特殊主义关系型社会关系网络是海外华人对华资本投资经济活动中的中介。

不过，从经济学立场考察，投资首先是经济活动，是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有效方式，同时，也应注意到，包括海外华人对华投资在内的跨国投资只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常规表现，只不过不断逐利乃是资本的内在属性而已，海外华人对华投资活动也概莫能外，利润（市场优先效益）自然是海外华人在对华投资方面的根本选择与首要考虑<sup>①</sup>，而华人文化传统中特殊主义关系型社会关系网络及其社会资本只是促成这一经济交易实现的纽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力日增，市场广阔，富有商机，因此，海外华人在对华资本投资经济活动中，受经济利益第一理念驱动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其间虽有“觅情”（例如“寻根”、“报恩”和“光耀门庭”、“光宗耀祖”等社会文化动因）的组成部分或者构成成分，但是其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应当始终占据有主导性位置。这从近年来海外华人对华资本投资区域选择地逐步扩大，逐渐从原先的福建、广东及浙江等侨乡密集省份逐步延展到日益开放与充满商机的北部沿海以及内陆其他地区的经济作为也可以有所佐证。

#### 四、讨论与结论

综上，关于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现象的经济社会学解读，本文得出两点可能具有某种创新性的认识：

其一，在对海外华人对华投资现象的经济社会学考察中，循沿“文化传统—关系社会—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交易费用—‘利’主‘情’辅”的行文线索，不难发现，凭借华人文化传统中的特殊主义取向群体互动人际关系网络，在

海外华人对华投资过程中，“寻利”与“觅情”是相辅相成的，个中，经济层面的“寻利”是主动因，社会文化层面的“觅情”是辅助因，易言之，“觅情”是“表”，而“寻利”是“里”。反过来，海外华人对华投资中的“寻利”和“觅情”活动的本身又增进了华人文化传统中的特殊主义取向群体互动人际关系网络的粘合度。

其二，海外华人对华资本投资中所投的“资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资本”，其由用于财物器具供给的“物质资本”和用于管理、技术供给的“人力资本”共同组成；另一类是非经济的“社会资本”。两类“资本”相辅相成，其中，“经济资本”为主，“社会资本”为辅。易言之，“社会资本”是“表”，而“经济资本”是“里”。这样，作为“投资方”的海外华人（群体）向祖国大陆所投的“资本”就不宜理解为仅仅是经济层面上的“资本”，还有基于华人文化传统的特殊主义取向群体互动人际关系网络中镶嵌的桑梓之情，例如“寻根”、“报恩”乃至“光耀门楣”、“光宗耀祖”<sup>②</sup>等社会性“资本”；而作为“引资方”的中国大陆在获益的同时，对身为“投资方”的海外华人（群体）回馈的也不只是丰厚的经济收益，同样有基于华人文化传统关系网络中镶嵌的舐犊之情，例如凝合促进文化认同、国族认同等社会性“资本”。

所以，无论是对于海外华人群体而言，还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海外华人投资的本身是一个互动双赢的过程。也正是因此，关于海外华人投资现象解读，虽然经济学基于理性计算的“经济人”是一个强有力的解释视角，但是社会学基于关系网络的“社会人”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解释视角。此二者同样也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责任编辑 陈 斌）

<sup>①</sup>海外华人对华资本投资活动中即便有“纯粹”的企业慈善捐赠含量，也不排除其中可能蕴含有其他更为丰富的管理学意蕴，例如迈克尔·波特力倡其战略性慈善行为理论（Strategic philanthropy），或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学者伍德（Wood D. J）所言“企业慈善捐赠是一种蓄意将企业捐赠与企业经济目标联系起来努力”。Michael E. Porter, Mark R. Kramer, “Philanthropy’s New Agenda: Creating Valu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9.

<sup>②</sup>实际上，如对中华文化若干特质细细权衡盘量之后，也可以发现，造福乡梓与光耀门庭是一体两面，即便是“衣锦还乡、光耀门楣、光宗耀祖”之类在官方宣传中常被赋予褊狭式解读的理念，因此具有不少积极正面的道德约束意义，例如，一名靠倒卖“地沟油”或“毒奶粉”之类“毒食品”而发财致富的经商者不大可能在坟头祭献时，引以为豪地对祖宗先灵说自己通过毒害同胞、他人的方式而致富有方，现在请求祖先们安心享此“无毒”祭食，并荫庇他们继续制假贩假而流毒四方吧。所以，关于“对得起祖宗与承得起香火”这类文化价值需要再作慎重思虑，而不是继续予以狭隘化认知与宣传。（如，社会学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亚历山大即认为文化等同于价值，探讨“人们如何使生活有意义”。参阅[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66~86页。）